



武汉大学起源新议

李少军

摘要：民国最早的部属师范学校之一、也是武汉大学前身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以清末两湖师范学堂等为先驱；而1916年开办、成为武汉大学另一重要源头的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则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为树立武汉大学基础而成立。武汉大学实为清末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新式学堂在民国时期进一步发展而结出的一大硕果。

关键词：武汉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商业专门学校；两湖师范学堂；张之洞

围绕武汉大学的起源问题，学界内外有不少议论。从晚清民国新式教育发展的关联性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兴味、值得探究的实例。故此，笔者在近日翻检相关中、日文史料的基础上提出管见，尚祈同好指正。

一、对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基础的再认识

1913年设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为武汉大学的前身，这一点已是人们的共识，但对清末张之洞在武昌办学是否直接为该校的设立打下了基础，则是见仁见智。近日笔者重读一则常见史料，即北洋政府教育部1918年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概况》（以下简称《概况》），感觉其或可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故此，不惜多用些篇幅，将其摘录如下（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民国元年，本部定高等师范学校为国立，并拟定地点，酌设六校，除北京、武昌两校已经成立外，其余四校尚未能完全设置，然此项学校为全国师资之根本，故历经本部竭力经营，虽按诸原来计划未竟厥功，而推行之程序及经过之情形固厘然可考……

（甲）处理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事项：

（一）应行收束者，如山东、河南、湖南、江西各省旧有之校，办法参差，难期实效，且不在规定地点之内，已经部令一律停止。

（二）应行维持者，如南京、成都、广州各校，均在规定的地点之内，仍准由省费继续办理，俟国库稍裕再为接收。至直隶一校，本应停办，近查该省中学尚缺乏文史各科教员，故亦暂准开办此项专修科。

（乙）整顿高等师范学校事项：

（一）改订北京高等师范课程标准……

（二）变通武昌高等师范分部规程。该校学科原分六部，继因附近各省中学教育多未发达，中学教员往往不患所任学科之不专，而患所任学科之不多，特改历史地理部为国文史地部，改数学物理部为数学理化部，改博物部为博物地学部，藉合地方之情势，以养成适用之人材。

……

(丙)筹备高等师范教育事项：

(一)陕西高等师范学校亟须早日成立，以为西北学子升学之地……

(丁)增设高等师范学校事项：

奉天省分原不在规定地点之内，因东三省地居边要，具有特别情形，应行增设，以储师资。

遂就奉天两级师范旧址改建一校，定名为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于七年十二月成立。^①

如《概况》所言，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后，很快就对上下都高度重视的高等师范教育的推行作出了部署，规定在北京、直隶(保定)、南京、武昌、成都、广州六地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这一史实原本广为人知，但有一点却往往被忽视：教育部当时“规定地点”，并不是着眼于在全国均衡地发展高等师范教育，因为在“规定”的六地中，武昌、南京、成都集中于长江流域，占了一半，此外就是京畿一带和广州，不仅不涉及东北、西北、西南大部分省区，就连山东、浙江、福建和上海这些沿海省份、城市也不在“规定地点”之内。对于如此安排，似可作出这样的解释：当时教育部因财力支绌，无法在多处同时开办高等师范学校，而只能将此前已有较好办学基础之地作为“规定地点”。《概况》中还说，在六地开办高等师范学校之后，另外一些地方将“旧有之校”改为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但教育部却以这些学校“办法参差，难期实效”为由，“部令一律停止”。这表明，当时即使对源于“旧有之校”的省立师范学校，教育部认为基础条件不好的，也不准办。由此不难想见，教育部在考虑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地点”时，只会对那里的办学基础有更高的要求^②。而从列入“规定地点”的六地来看，多数确为清末近代教育发展十分显著的区域。学界的研究对此已有充分揭示，无需赘述。就武昌而言，从1890年张之洞开办两湖书院到武昌起义爆发前，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积累已历时20来年，成效早已蜚声海内外。在清末新政中，师范教育又得到张之洞的特别重视而在1902年后成为其办学的重点，于是，源于两湖书院的文高等学堂，就在1904年被改为两湖师范学堂(后称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它与民国初年的高等师范学校大致相当。据日本人在1909年作的调查，该学堂1年的经费投入为5万元，有学生480人、中日教习51人，经费、学生和教习的数量都仅次于陆军特别小学堂；此外还有从两湖师范学堂分出的理科专修科学堂和博物专修科学堂，1年的经费均为18000元，分别有学生114人、120人，中日教习18人、11人；至于方言学堂，1年的经费为3万两，有学生200人、中国教习12人、英法德俄教习各1人^③。这些学堂中，理科专修学堂与方言学堂因经费困难而在1911年旧历二月被一同停办，其它都一直开办到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教育部将武昌纳入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地点”，与此前这里已有较好的高等师范教育基础和相对较多的新式教育资源，当然是密不可分的。

再回到《概况》。其中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使在六所部属高等师范学校之间，直到1918年，也还存在着很大差别，“除北京、武昌两校已经成立外，其余四校尚未能完全设置”，“按诸原来计划未竟厥功”。也就是说，在教育部看来，取得了预期成效的只有“北京、武昌两校”。所以，教育部只将这两校作为进一步完善的重点对象，而将其他学校作为“应行维持者”。这样看来，民国初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成绩领先于同侪，是毋庸置疑的。但究其原因，既不在于这里环境比别处好，也不是由于其经费格外充足。实际情况是，辛亥首义之后，武汉经历了十分惨烈的阳夏之役，其后也一直处于动荡之中；而办学经费则在清末就已十分竭蹶，方言学堂和理科专修科学堂等被迫停办就是证明；在民国初年，恢复在战争中损毁市区的沉重压力与军费的浩大开支，更使地方财政朝不保夕，不可能拿出多少钱支持办学。1918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师范学校概况》中说：“查近两三年统计，各省师范教育费尚幸增者多而减者少，如皖、桂、川、浙四省岁增四五万至六七万，鲁、赣、闽、豫、鄂、陕、甘诸省岁增三万或一二万，直隶、江苏且增至十万以上”^④。这表明，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全国高等学校概况》明言，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开始强调在全国平衡发展高等师范教育的问题，于是就有了亟须开办陕西高等师范学校之议、12月在沈阳开办此种学校之举。

^③ 见《送第234号·武昌各官立学堂现状报告ノ件》(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桥橘太郎1909年7月22日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伯爵)列出的《武昌各官立学堂现状一览表》。该表显示陆军特别小学堂1年的经费是12万两，学生有1030人，中日德教习共有81人，三个方面在各学堂中都居首位。此资料见于日本外务省外交事馆藏：外务省記録B-3-10-2-38。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武昌所在的湖北省,民国初年在对师范教育投入有增长的省份中,位次是相当靠后的。由此不难看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所能得到的地方财力支持,远不及外省区绝大多数同类学校,它是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取得骄人的成绩的。这固然应归功于任事者的艰苦奋斗,但更离不开清末张之洞在武昌长期办学所打下的相对深厚的基础。

笔者认为,这种基础对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所起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为之提供可直接沿用的场所和其他有形的设施、资料^①,更重要的是为其建立课程体系、展开教学作了较好的先期准备。试看1913年2月《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的规定:“本科分为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本科各部“通习之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而各部开设的主干课程,在国文部有国文及国文学、历史、哲学、美学、言语学,英语部则是在国文部课程的基础上多出英语及英文学一门,历史地理部有历史、地理、法制、经济、国文、考古学、人类学,数学物理部与物理化学部同样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图画、手工,只是数学课程的位次不同,博物部有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及卫生学、矿物及地质学、农学、化学、图画。应该说,教育部规定本科各部要开设的上述主干课程,绝大多数涉及在当时还属“新学”的学问,如无相应基础和资源,就无法较快开设,即使仓促开设,也不能保证有良好的教学质量。而在武昌,如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博物、农学、人伦道德、文学、英语等外语、历史、地理、天文、教育学、卫生学等课程,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年,就已由“两湖书院”、“矿务学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湖北省师范学堂”等相继分别开设;而在1904年改“文高等学堂”为“两湖师范学堂”后,伦理、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博物、中国文学、英语、历史、地理、教育、手工、体操等,都成为该学堂及其分支学堂开设的课程。可见,民国初年教育部规定部属高等师范学校必须设立的主干课程,此前在两湖师范学堂及其分支学堂大体上已经开设,同时在武昌还具有开设其他课程所能利用的资源。

总之,武昌在1912年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为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之地,该校能够较顺利地设立各分部,较快建立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体系而展开教学,领先于同侪,都直接得力于清末张之洞在武昌长期办学所打下的基础;而将较为集中地体现这种基础的两湖师范学堂视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先驱,大概也不算牵强。

二、对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在民初率先筹办武汉大学的考察

作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先驱的两湖师范学堂,在武昌起义之后停办了。今人似乎都不觉得该学堂的人士与后来的武汉大学之间会有什么关系。但是,笔者看到的1916年5月16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濂川浅之进致其外务大臣的报告,却道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民国初年,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的人士率先发起筹办武汉大学,他们与武汉大学有不解之缘。

兹将濂川浅之进报告(以下简称《濂川报告》)的译文揭示如下(文中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武昌应该设立公立武汉大学之议,湖北省教育界有关人士久已倡言,民国二年得到巡按使批准,该大学创立事务处在武昌城内设立,以原两湖师范学堂教头马宙伯、周堂等作为核心人物,筹划该大学创立事务,但经费问题还是很难。然而到今年三月,当局批准该大学的经费由湖北省从中央政府贷款150万元的利息和省内米税中支付。此次鉴于省财政困难的现状,决定改变原先的计划,从经常经费中每年拨给26000元,当下按高等商业学校程度,在武昌三道街原存古学堂的旧址创办,名为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第一批学生报考时间截止于今年六月十日,从八月开始上课。武汉大学创立事务所设在该商业学校之内,徐图进行。事务所所长之职由该校校长兼任,此外不另行支付事务所的费用。此事已由《湖北公报》发表。该校校

①当时在武昌,因战争而停办的学堂不少,而之所以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设于原方言学堂旧址,可能是由于这里交通条件好,符合教育部将部属学校设于“交通较便之处”的要求。另外,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1912年9月6日在致其外务大臣的报告中,依据“都督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9月3日的报道,称黎元洪要在都督府内开设“军事大学”(见《公信第32号·武汉情报送付ノ件第60号》〔1912年9月6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记录B-3-10-2-38)。对照中方记载,这所“军事大学”应该就是在邻近都督府的方言学堂旧址开办的武昌军官学校。但随着黎元洪1913年12月赴京,该校不能继续办下去,其校址就直接转作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设立之处了。

长是由前审计处总办王璟芳等在北京而原籍为湖北的有权势者十多人及湖北巡按使推举的汪济舟(日本早稻田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革命事变时任湖北财政部长)。

《瀨川报告》的基本内容,来自当时的湖北省政府所办报纸《湖北公报》^①;瀨川在其引言中说,内容系调查所得;报告提及的王璟芳、汪济舟的情况都合乎实情,所言国立武昌商业学校的名称与地址也完全准确。而在此之前,《申报》1915年8月29日第6版已有题为“武汉大学决定开办”的报道,内容如下:

黎副总统在鄂时,与刘心源、夏寿康、饶汉祥三前省长及湖北诸名人公同发起创办武汉大学,以为共和发轫地之纪念。嗣因经费无着,兼之国立、省立成为问题,久未解决,致徒设筹办处于官立法政学校。迄今三载,成立之声浪不绝于耳鼓,而根本上未得巩固,故频起频灭,鄂学界之关心者已望眼欲穿矣。刻旅京官绅周树模、夏寿康等开最后会议,以办则从速组成,否则即行消灭,勿再空悬此招牌,贻讥于乡人。于是众议僉同,决定维持方法,定名湖北省公立武汉大学,开办经常各费,则在交通部拨还鄂路米捐股百二十五万之国家债票息厘项下提用,此款现存财政部,系以只准支取利息金办理地方公益为定案也。

大致在《瀨川报告》发出前后,杭州的《教育周报》也作了题为“武汉大学始基”、与《瀨川报告》内容相当接近的报道:

武汉大学原为起义纪念,前已设立筹办处。因所指拨鄂路米捐股现存部中,未允拨充经费,仅年拨息金二万六千元,不敷设立大学之用,议定先行开办商业专门学校,以树基础。大学筹办事宜,则徐图进行。现商学校长一席,因无相当人员可派,已咨由鄂使与绅学界商妥,委汪济舟充当。即以前存古学校为校舍。该筹办处附于该校,由校长兼办,以一事权而节经费。刻已预备招生矣。^②

以上三则中、日文史料,内容契合度很高,足见《瀨川报告》有相当的可靠性,而《瀨川报告》引人注目的内容,则是凸显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作为“核心人物”发起筹办武汉大学^③。下面,笔者就基于上述史料,辅以其他档案文献、著述,对民国初年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发起筹办武汉大学的问题进行深入考察。

首先,湖北省教育界有关人士倡办武汉大学的缘起。

《申报》的报道指出黎元洪等政界人物与“湖北诸名人”公同发起设立武汉大学,且和《教育周报》一样,强调此事与纪念辛亥武昌首义的动机相关。这反映出此事有特定的政治因素,值得重视。但是,以《湖北公报》的报道为依据的《瀨川报告》,却突出强调“湖北教育界有关人士久已倡言”;而在该报告之前的1914年4月3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的呈文,也提到“湖北武汉大学筹办处呈称:查武汉大学前经士绅议定”云云,凸显出设立武汉大学的主要发起者是“士绅”。所以,笔者认为,民国初年由湖北教育界有关人士发起筹办武汉大学也是确凿的事实。并且,探究此事的缘起,还不能离开民国初年教育部重颁学制、将清末的“大学堂”改为“大学”的背景。

追溯起来,1904年清朝颁布的“癸卯学制”,已经将“大学堂”作为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并有逐渐在“各省设立大学堂”的规划^④。而对于兴办近代教育最为热心的张之洞,早在1902年5月,就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又称两湖大学堂)了,但他在“癸卯学制”颁布后,却因为师资等条件不足,

①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1866-1911》(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309页记曰:《湖北公报》于1912年6月10日作为湖北军政府机关刊物发刊,以刊布湖北地方法令、章程为主要内容,所刊法令与正式公文有同等效力,按日出版,1924年停刊。除该书所提及的1912年该报内容外,国内目前能看到1915年出版的该报,但1916年等年份的尚待查找。

②佚名:《武汉大学始基》,载《教育周报》1916年第127期,第18页。

③武汉大学教授严清华等曾于2008年11月14日在《武汉大学报》第4版发表《武汉大学经济学科的另一源头——国立武昌商科大学》一文,指出原广东道尹王韬庵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明确倡议以米厘公股设立武汉大学,认为这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早使用“武汉大学”名称的倡议,并推测这一倡议提出的时间大约是1912年或1913年。文中还写道:王的倡议旋即得到曾任湖北省咨议局局长和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时任中华民国参议院议长的汤化龙和曾任湖北省咨议局副局长、后任湖北省省长的夏寿康,以及时任湖北省议会议长的王铁公等人的赞同。当时那笔款项实已归交通部掌握,幸赖王韬庵全力争取,始答应拨该款之利息筹备武汉大学。王韬庵不久逝世,后赖汤化龙等人继起维持。延至1916年,王铁公乃召集同仁商定先设商业专门学校作为武汉大学之基础。议成后即报教育部批准,决定设立国立商业专门学校于武昌。1916年9月,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武昌三道街存古学堂旧址宣告成立。根据当时的高等学校章程规定,学生全部学程为4年,其中预科1年,本科3年,修业期满,经考试合格,授予毕业证书。学校开办当年共招收两个班计96名学生。此文所述情况可与拙文所引中、日文史料相互参证,值得参考。

④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573页。

且认为当务之急是兴办师范学堂,而在1904年7月将两湖高等学堂改为两湖师范学堂^①。清民鼎革后成立的北洋政府教育部,急于继续推进从清末就已开始的国民教育体系的构建,为此而重颁学制,其中的一环,就是于1912年10月24日、1913年1月12日先后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令》。就两令所规定的大学相关制度来看,与“癸卯学制”基本一致,变化只是将“大学堂”改称“大学”、将“大学堂”的“通儒院”改称“大学院”而已^②。在此背景下,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而湖北教育界人士的注意力显然也被《大学令》、《大学规程》所深深吸引,因而相当迅速地倡办武汉大学。而当时的湖北政界人士正好乐得将此与纪念武昌首义联系起来、借以彰显本地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因而在1913年很快批准了教育界的此种提议。由此,“武汉大学筹备处”也就得以在武昌的法政学校设立起来。从《申报》所言“迄今三载,成立之声浪不绝于耳鼓”,“鄂学界之关心者已望眼欲穿”来看,湖北教育界人士对此事的态度相当急切。受此推动,曾是湖北政界头面人物的汤化龙在担任教育总长之后,于1915年1月下旬令教育部秘书毕惠康专程到湖北“调查武汉大学筹备事宜”^③,而他本人后来还被“公推”负责草拟“武汉大学”的“内部组办法”。

其次,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作为倡办武汉大学的“核心人物”的由来。

《濂川报告》明言他们是筹办的“核心人物”^④,故倡言者中当然不可能没有他们,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申报》的报道则称:1915年8月在京湖北籍官绅为设立武汉大学举行会议后,“校长一席闻有于张仲炘、姚晋圻、时象晋、饶菽光四人中择聘之说,并闻姚最为有望”。查张仲炘与两湖师范学堂没有直接关系,饶菽光的经历不明,但姚晋圻是光绪十八(1892)年进士,后为翰林院庶吉士,清末曾任两湖书院史学教习及其院长、湖北省教育会会长、咨议局议员,1912年被公举为湖北省教育司首任司长,而同时任副司长的李步青,则与时象晋同为原两湖师范总学堂的知名教习,时象晋在1913年又继姚晋圻之后做了湖北教育司第二任司长^⑤。据此笔者认为,两湖师范学堂人士在民初湖北教育界是占主导地位、威望最高的;而《申报》所言准备“择聘”为武汉大学校长的人选中,至少有两位是原两湖师范学堂相关人士,且姚晋圻呼声最高,也可印证《濂川报告》所言该学堂人士是倡办武汉大学的“核心人物”不虚。笔者认为,这种情形决非偶然。如前面所述,教育部在1912年将武昌作为设立部属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地点”之一,是充分考虑到清末武昌师范教育的水准与影响而作出的抉择,此举当然会使原两湖师范学堂的人士大受鼓舞,他们早已在湖北教育界享有很高威望也是理所当然。1911年8月2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对其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发出的报告,或许有助于证明这一点。该报告称:剑桥、牛津等英美大学久已酝酿在华中地区开办大学,该大学的“课程有外国语、欧洲古典、纯高等数学及应用理化学、医学等,都按欧美大学的科目授课,只是要与清国的情况相适应、做些特别的取舍而已”;“约在3年以前,英国方面的委员派出从一开始就最为热情的支持者 Lord William Cecil 选定适于设立的场所,他在亲身巡视各地之后,选定了此地(指武汉——引者),最终得到委员会同意”;“该大学命名为武汉大学,设立的相关费用为25万英镑”;“该大学拟招收清国各官办高等学校及传教士开办的高等学校等的毕业生,考生多半要接受与 bachelor of art 程度相当的入学考试”^⑥。从这个报告可知,英美高等教育界在清末

① 皮明麻:《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第106页。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108~110,114页。

③ 孙宝琦、周自齐:《政府公报》第979号,1915年,第27页。

④ 关于《濂川报告》所言直接出面筹办的原两湖师范学堂“教头”马宙伯、周堂:与日文“教头”对应的确切职名尚待查考。周堂的情况尚不明了。马宙伯确有其人,目前所见相关记载,主要涉及他在民国初年充当共和党湖北支部的骨干、1917年以后做过较短时间的宜昌海关监督、在此前后在武汉办报等经历。两湖师范学堂毕业生、在马宙伯1916年开办的《正义报》做记者兼编辑多年、深得马宙伯倚重的蔡寄鸥,在晚年所写《武汉新闻史》中说:马是黄陂人,“为人手段敏捷,个性极强,具有世界眼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一切常识,也极其丰富”(见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但马宙伯与两湖师范学堂的具体关系,还需进一步查考。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蔡寄鸥还提到:辛亥首义后在武昌开办的影响甚大《中华民国公报》,前后四任社长及职员都是原两湖师范学堂的毕业生,“有人说《中华民国公报》,完全是两湖同学会,这句话是合乎事实的”。“湖北之有杂志社,自《教育杂志》社开始,继起的,还有《经济杂志》社……《教育杂志》社为两湖总师范同学所创办……《经济杂志》社为理化专校同学所创办”(《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第482、485-486页)。由此可见,民国初年武汉的报刊舆论、尤其是文教方面的舆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相关人士主导的。这也可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时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充当倡办武汉大学的“核心人物”的背景。

⑤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 《公信第194号·武汉大学设立计划二関シ報告ノ件》(1911年8月23日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侯爵),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記録B-3-10-2-38。

派人华中各地进行了长达3年的考察,于武昌起义爆发前夕认定武汉对于欧美模式的近代大学而言是“适于设立的场所”,这里的官办高等学校与外国教会所办高等学校能够为这样的大学提供合格的生源。而当时在总体上代表武昌官办学堂最高水准的原两湖师范学堂的人士,极有可能了解这一情况,因而他们就有底气和自信充当倡办武汉大学的“核心人物”。

第三,倡办人士将其希望设立的大学定名为“公立武汉大学”的原因。

清民鼎革后,湖北与湖南两省在行政上不再属同一疆吏所辖,故在武昌新设立大学自不宜仍用“两湖”来命名。而以“湖北”来命名,原本最合情理,同时也有不少以省名来命名大学的实例。再者,如同此地的部属高等师范学校冠以武昌之名那样,以“武昌”来命名,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而“武汉”这一名称,虽然从晚清以来就由中外人士广为使用,但直到民国初年,还没有成为法定的行政区域名称,以此命名新设立的大学,在当时未免有奇异之感。但是,倡办人士还是选择了“武汉大学”这个名称。这与武昌起义前夕英美人士紧锣密鼓筹备带教会大学色彩的“武汉大学”的动向,或许不无关系。

至于将武汉大学冠以“公立”,则明显反映出倡办人士要继承清末以来的官办传统。《申报》说得明白:湖北人士倡办武汉大学之后,“国立、省立成为问题,久未解决”。笔者认为,这里大有缘故。就湖北政界、教育界人士的初衷而言,无疑是向北京大学看齐,要使未来的武汉大学进入国立之列。后来作为设立武汉大学第一步而成立的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正式开办时定位国立,即为明证。但是,教育部最初对于大学,并没有像对高等师范学校那样明确规定设立若干部属学校,实际上还无意改变清末只以京师大学堂直属中央的布局。故此,即使在北京大学之后较早跻身国立大学之列的北洋、山西两所大学,在民国之初也是“原系省立,自民国七年度起,经费由国库支給,乃改为国立”^①。所以,要办国立武汉大学,难度很大。1915年8月在京湖北籍官绅会议将筹办对象定名为“湖北省公立武汉大学”,所谓“湖北省公立”语意含浑,且揆诸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无关于“公立”的规定,此语的出处是该部1912年10月22日颁布的《专门学校令》^②。如此定名的缘由是:他们依然寄望于国立而不想办成省立,但又没有把握,于是就别出心裁,利用《专门学校令》对专门学校所作公立、私立的划分,移花接木,提出了“湖北省公立武汉大学”这一富有弹性的名称。

第四,武汉大学设立迟滞的最大瓶颈。

开办“公立武汉大学”的提议最迟在1913年提出,并在这年得到湖北官方批准,然而,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正式设立国立武汉大学,距最初动议,竟耗去了15年光阴,令人不胜感慨。如果将武汉大学设立迟滞归因于北洋政府对湖北的忽视乃至打压,似乎并无实据。相反,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最早作为部属学校设立,却能反映北洋政府对这里的重视。而充当北洋政府首任副总统、在袁世凯死后又继任总统的黎元洪,还是最早倡言设立武汉大学的政界重要人物之一,更表明湖北就办教育来说在中央还很有政治资源可用。实际上,《濂川报告》和《教育周报》讲到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校长人选的确定,都指出了“在北京而原籍为湖北的有权势者”所起的作用。还应注意的是,1918年的《教育部公布全国大学概况》说:当时中央“直辖专门学校设立在北京者四所,历年以来仍旧办理,民国五年增设武昌商业专门学校一所”^③。也就是说,直到1918年,全国共有中央“直辖专门学校”5所,其中4所在北京,而各省中唯一的1所就是武昌商业专门学校。离开政治因素,不能解释这种现象。

再看本节所列中、日文史料,三者对于武汉大学长时间处于筹备状态的原因所作的共同、唯一的解释,就是“经费无着”。在此问题上,1914年4月13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财政总长的呈文,提供了目前所见最确凿的证据,内称:“武汉大学前经士绅议定,以汉粤川铁路鄂省公股米捐项下共银一百三十三万五千余两、又钱四十三万五千余串,充作大学基本金,以每年约得息金十三万余元为常经费,以民元、二年应得息金约二十六万元充开办及建筑校舍之用,以将来红润所得充改良之需。”这表明,由于湖北省从一开始就不能指望以中央财政拨款来办武汉大学,故筹办者想以清末所募汉粤川铁路鄂省公股米捐

①《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176页

②《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107、108页

③《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第180、181页

之每年所得利息 13 万余元作为武汉大学的常经费,且从 1912 年算起。但是,这一要求遭当时掌管此款交通部拒绝,国务总理孙宝琦、财政总长周自齐也表示这一要求“似与前清邮传部原案未符”,而只同意“酌拨若干充武汉大学基本金”^①。而《教育周报》的报道又言明:直到 1916 年,“所指拨鄂路米捐股现存部中,未允拨充经费,仅年拨息金二万六千元”。对此数额,《濂川报告》的说法也完全一致。而将此“年拨息金”与上面提到的 1909 年武昌几个学堂 1 年的经费相比,只相当于两湖师范学堂 5 万元的半数稍多,也不及方言学堂的 3 万两,较之理科专修科学堂和博物专修科学堂的经费之和 36 000 元,也还差 1 万元之谱,确乎“不敷设立大学之用”。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与湖北省如此恶劣的财政状况,正是使武汉大学的设立长期迟滞的最大瓶颈。

第五,筹办人士的坚韧努力及对国立武汉大学的奠基之功。

从《濂川报告》和《教育周报》的报道可见,武汉大学的筹备机构从 1913 年设立,直到 1916 年 5 月依然存在;并且,在这年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办以后,筹备机构的经费不再专门拨给,然而这个机构仍没有取消,而在该校继续设置,并由其校长兼任负责人,足见筹办人士大有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之概。如此坚韧努力筹办一所大学,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实在是值得赞颂的一笔。同时,对筹办人士的深谋远虑也不可不察。面对巨大困难,他们决定变通计划,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先从具有大学性质但层次稍低的专门学校办起,以树立更高层次的武汉大学的“基础”,“徐图进行”。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具有可行性的最佳选择。另外,选择开办商业专门学校,在武昌也是有其渊源的:早在 1893 年,张之洞开办自强学堂,就设有商务一门^②;在 1909 年日本人所制《武昌各官办学堂一览表》中,也有商业学堂在内,其 1 年的经费为 17 400 元,当时有学生 210 人^③。看来,筹办人士对于利用清末以来武昌的办学基础和资源是有充分考虑的。同时,似乎可以认为,他们还要以此为设立由多学科组成的高层次武汉大学创造条件。后来的历史告诉人们,尽管财力依然是相当不足,但立足于较深厚基础之上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还是站稳了脚跟,进而在 1924 年升格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旋被视为“中国中部有代表性的国立大学”^④)。众所周知,在 1926 年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组建,继而在 1928 年国立武汉大学设立时,国立武昌商科大学是主要基石之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于武汉大学,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有不可磨灭的奠基之功。

三、结 语

综上所述,笔者所得结论是:将武汉大学的起源追溯到清末张之洞在武昌开创的新式教育,是完全合乎历史实际的。1912 年教育部决定设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是以清末的两湖师范学堂为先驱,不仅利用了清末方言学堂的校址等设施与资料,而且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也得益于张之洞所办各学堂已有的基础;1916 年开办的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则是由原两湖师范学堂人士等为树立武汉大学的基础历尽艰辛而成立,且利用了清末存古学堂的校址和从自强学堂开办以来积累的商科教育资源。而由两校升格而来的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后来汇聚到一起,就成了 1926 年组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 年开设国立武汉大学的主要基石。史实证明;武汉大学是清末张之洞在湖北开创的新式学堂在民国进一步发展而结出的一大硕果。这对于将晚清民国之间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视为一个连续过程的认识,也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作者简介: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lsjwrh@163.com

● 责任编辑:桂 莉

①《政府公报》第 696 号,第 129 页。

②《湖北省志·教育》,第 44 页。

③见《送第 234 号·武昌各官立学堂现状报告ノ件》(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桥橘太郎 1909 年 7 月 22 日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伯爵)列出的《武昌各官立学堂现状一览表》。

④《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附属图书馆へ図書寄贈方ニ関スル件》(1925 年 9 月 14 日日本外务省文件),见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外务省記録 B-H-06-02-00-26-00-02。